

如果说“摔婴”只是肇事民警的个人行为,那么“捂事”显然就是一种集体过错,这无疑更令人担忧。这样“整齐划一”对法律的亵渎,对公平正义所带来的伤害,将被成倍地放大。

警察摔婴岂能内部处理

7月20日,河南林州民警郭增喜酗酒后突然抢走街上一男子怀里7个月大的女婴,举过头顶猛摔在地,险些将其摔死,而涉事民警却只受到关禁闭15天的警务纪律处罚。事件经媒体报道后,当地回应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,郭增喜也已被警方控制。

(8月18日《长沙晚报》)

据了解,事发之后,林州市公安局对涉事民警处以了关禁闭15天的内部警务纪律处理。当然,执行得如何只有林州市公安局知道;并且据林州当地数位知情者对媒体表示,案发后摔婴警察郭增喜通过林州市公安局一位领导做中间人,赔偿受害者家属几十万元封口费,要求“私了”。

这正符合了许多地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惯常做法:封锁舆论;内部处理肇事者;组织各种公关,威逼利诱受害人接受“私了”,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殊不知,这套以“内部

化”为核心,过去看起来屡试不爽的“组合拳”,在资讯交流日益发达、公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,只能是一错再错、一蠢再蠢。

肇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、众目睽睽之中对无辜婴儿行凶,引起林州议论纷纷,这已经是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公众事件了。而林州警方不但不立案,还妄图以所谓“内部处理”敷衍了事,这不仅滥用“内部处理”权,而且是明显的渎职。

同样的公众事件,每每当肇事者有公职身份的时候,“内部处理”就成了护身符和挡箭牌,而普通平民就只能享受“依法严惩”的正义判决,这是极大的不公。事实上,公职人员知法懂法,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,监守自盗不但得不到从严处置,而且还有“内部处理”撑腰,令人无可奈何,这真是对公职身份和法治社会莫大的讽刺。

事实上,所谓“内部处理”的小众化、私密化、随意性等特点,根本就和

法治社会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精神相背离。历史和实践证明,“内部处理”有与生俱来的弱点,即便有严格的法治程序者如“军事审判权”,在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也照样面临着种种质疑,前不久的台湾士兵洪仲丘猝死案中,民众要求回归一般司法审判即是明证。所以“内部处理”的特权让位给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普通法治,是时代进步的大势所趋。

在当前的情况下,即便“内部处理”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,任何做出“内部处理”的机构也须秉公处理,做到虽是内部,却公平公正、不惧公开,经得起公众的检验。如此,“内部处理”尚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可。当然,属于公众事件的处理,尤其是违法犯罪事件的处理,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公众的场域中来,回到一般司法程序上来,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,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所在。

(据光明网)

地方人大为何管不了“民警摔婴案”

民警摔婴案被雪藏了一月,当地才迫于舆论压力“依法处理”。人们不禁要问,倘若此事不被曝光,所谓的“依法处理”,会不会遥遥无期?

对身边不公不义的现象不沉默,勇敢揭开地方吏治之丑,林州这几位人大领导的勇气和良知无疑值得敬佩。不过也要看到,作为地方人大的领导,为何没能通过法律赋予人大的种种权力,对“民警摔婴案”依法进行监督,而只能充当爆料人的角色,向媒体求助?

要知道,按照法律,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,享有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。法律也赋予人大机关诸如约见官员、询问、质询、特定问题调查等一系列权力。具体到“民警摔婴

案”,公安局长由人大任免,民警犯下重大罪行,公安机关却一味袒护,以家法代替国法处置,这时候,地方人大完全可以依照程序,请林州市公安局长到人大接受质询,要求纠正并追责。如果林州市公安局长不予理会,人大可以投票罢免他,可以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,亲自介入调查。

然而,手握重权的林州人大及其常委会,为何会显得无奈呢?

这暴露出当下一些地方民主监督的不足。由于种种原因,地方人大对于政府部门的监督,多体现在一些程序性监督上,而个案性的、实质性的监督,则不多见。在少数官员思维里,人大质询、特定问题调查、撤职等依法履职,被认为

是“作对”、“找茬”;一些人大官员,本着“和为贵”,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人,采取一些“针锋相对”的刚性监督手段;加之现有的法律对于质询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规定还不够细化,这些都影响到人大监督权力的施展。

“民警摔婴案”中,媒体曝光,当地“依法处理”,这是当前许多公共事件一贯的处理模式。媒体的力量逐渐生长,对一些公权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,起到了一定制衡作用。这是人们所乐见的,但同时,公众更希望,地方人大作为民主监督的中坚,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也能现身,积极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,当好公众利益的代言人。

(据《新京报》)

比摔童更恶劣的是有案不立

在河南警察摔婴案中,倒逼而来的依法查处不是法治的常态。舆论能够倒逼成功,包含了众多偶然因素。这种“偶然的正义”显然无法满足民众对司法的期盼。“林州摔婴案”也由此引申出另一种焦虑:该如何避免发生在司法领域的枉法与渎职?

渎职是显而易见的。尽管当地警方对记者的追访极尽躲避之能事,但有关此案的那份“内部通报”已然证明了警方的知情。不管嫌疑人郭增喜当时是在何种情形之下,有了摔童的行为,他都脱不了刑事追究的干系。对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严重罪案,居然久拖不立,且欲以内部处分来蒙混过

关,这背后的渎职留给公众心理的强大冲击,并不亚于摔童。

从性质上说,摔童可归入个人恶行,渎职却俨然是一种司法生态。要回应社会关切,除了对“林州摔童案”要回归法治、依法查处之外,对于当地司法机关所表现出来的极不正常的包庇与渎职行为,也应纳入法治轨道。安阳组建调查组,是一个好的迹象。但更关键的还在于,安阳市检察院甚至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当介入,并展开独立调查。本来检察机关被设计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监督公安。对于公安有案不立的,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以“要求公安机

关说明不立案理由”等权限。若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,还应“通知公安机关立案”,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。

但正是这些密织的法网,在“林州摔童案”中仿若成了“牛栏关猫”,徒具文本价值。要改变这一现状,有必要提升介入调查的检察机关级别,以排除在林州当地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当干扰。如果有渎职罪案发生却迟迟不立案,甚至长时间视而不见、有意忽略,这又将构成新的渎职。看来,法治的实现还离不开舆论的倒逼,尽管这并不正常,但“偶然的正义”也好过“无正义”。

(据《京华时报》)

警察摔婴案事件回放

婴儿父母一心给孩子治病

回忆起当时的一幕,30岁的母亲任文利至今仍然心有余悸:“在一家歌厅门口,我们当时好好地就在那站着,一个个头很高的男子走过来,抓起我家妞妞就举起来摔到地上,孩子当时哭了一下就没声了,我整个人都吓傻了。”

母亲说,看到孩子被摔一幕,“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。”父亲则表示,事发时完全没有征兆,“整个过程就2秒钟的时间。”

任文利告诉记者,事情发生后,当时路边围了很多,有打110报警的,有拦出租车的,还有打120急救的。“我顾不了别的,抱着孩子就去了医院,想着让我家妞妞能够活命,人都快疯掉了。”

父亲李青峰说:“那人看样子五十来岁,像是喝过了酒,我不认识他,也没在意,他突然抓起孩子的胳膊举起,过了头顶后又摔下来。”

李青峰表示,现阶段全家人都“一心扑在给孩子治病上,没时间考虑别的,就是希望她早日康复,别留下什么后遗症”。

被摔婴儿暂脱生命危险

18日晚间,记者见到了受害女婴。这也是事发至今,这一无辜的小生命首度出现在媒体面前。据现场观察和医生介绍,目前女婴暂时脱离生命危险,但会否留有后遗症,仍待进一步观察。

安阳地区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李鹏强告诉记者,7月19日凌晨转来的女婴患者经过治疗,8月5日已出院。孩子母亲任文利说:“妞妞现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害怕惊吓,有时半夜就惊醒了,白天听到路边的汽车声,就会紧张得抓住我不放。”

涉事民警应获何罪?

据刑法学专家洪道德介绍,摔婴警察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。

如果被摔婴儿经法医鉴定,其伤情达到轻伤以上,或已发生伤残,则该民警已涉嫌故意伤害罪。若伤情在轻伤、轻微伤以下,则该民警涉嫌寻衅滋事罪。

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广辉表示,刑事案件应交予相关机关立案侦查,双方私了也需要经过法院的同意。

同时,即使在法院的同意下进行了民事赔偿,涉事民警还需承担刑事责任。此案为刑事案件,而林州市公安局并未按照适当程序处理,对此案的进展造成了一定影响,相关领导应负一定的责任。

(据凤凰网、《北京日报》)